

周之澄,徐媛媛,周武忠. 长三角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景观基因及其设计利用[J]. 江苏农业科学,2023,51(16):255-264.  
doi:10.15889/j.issn.1002-1302.2023.16.034

# 长三角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景观基因及其设计利用

周之澄<sup>1</sup>, 徐媛媛<sup>2</sup>, 周武忠<sup>2</sup>

(1. 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上海 200051; 2.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 上海 200240)

**摘要:**乡村景观是乡村自然风貌、风土文化与村民生产、生活状态的最直观体现,也是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当下长三角乡村景观建设中存在如“大拆大建”、盲目模仿城市化做法、文脉传承不受重视等问题,导致了江南乡村田野景观的衰退。长三角区域内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具备良好而典型的文化景观元素,其长时间积累的文化景观基因值得设计利用,同时也应以之为中心构建乡村景观价值共创整体设计框架。乡村建设需要通过系统挖掘文化景观基因以彰显乡村地格,创新设计独具在地原真性的特色乡村景观,并在此过程中着力培养专业乡村设计师。减少对乡村景观的“建设性破坏”,恢复适地自然景观基础、延续人文景观脉络,围绕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景观基因设计具有场所记忆的在地“乡愁”景观,是倡导乡村美学、引领乡村景观有机更新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农业遗产;乡村景观;整体设计;景观基因;乡村地格

**中图分类号:**F32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1302(2023)16-0255-10

自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于2002年启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评定工作后,我国各地对“农业文化遗产”概念的认识与保护利用工作越来越重视,仅长三角地区就已有4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7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些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绝大多数叠合了江南文化烙印,具有较高的生态文化和景观美学价值。

随着“乡村振兴”与“长三角一体化”相继上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目前江南地区(本研究中主要指江、浙、沪、皖的部分相邻区域)的乡村景观建设在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发展位居前列的长三角区域也再度受到较高关注,“新时代美丽乡村”“特色田园乡村”“乡村振兴示范村”等抓手多条线并行,其成效有目共睹。但在发展过程中,曾经城市化进程中“大拆大建”的“跨越式”做法也在一些乡村地区显出了端倪,江南乡村田野景观的质量大大衰退。生态上,对乡土物种不够重视,盲目引进的外来动植物品种破坏了原生景观体系,影响了乡村生态系统稳定性,而城市景观元素的过度介入也会使

景观系统的运维脱离乡村实际,使地域性原生景观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生产上,不重视作为乡村产业根基的第一产业农业,丢弃了“精耕细作”的重农传统,导致大面积的耕地抛荒。在景观设计方法上流于对江南园林和城市景观的简单模仿,江南园林的文化深意遭到忽视,江南乡村的文化-景观融合度不高。虽然通过仿古建筑的重建或是在景观改造时运用有代表性的地方元素能使乡村景观焕然一新,但资源同质化利用所引发的“万村一面”问题极易造成乡村景观的建设性破坏。如何挖掘江南地区的“乡村空间基因”,创新设计江南乡村新景观,成为当下乡村建设行动过程中的当务之急<sup>[1-3]</sup>。

不少学者在如何传承乡村文化景观方面做过探索,保持乡村自然生态性的研究成果较丰富,但多从江南建筑、出土文物等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角提取表皮景观元素,鲜有从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内在精神提取乡村文化基因,对乡村景观进行整体设计。乡村地区的景观个性在于如何传承地格,依据在地的自然地脉和历史文脉,保护生态环境的自然性和历史文化的原真性,创新设计具有“乡村性”的特色景观。而针对“乡村性”的文化原真性,本研究试从长三角地区现有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梳理、提炼“江南乡村文化基因”,为乡村特色景观营造提供借鉴<sup>[4-10]</sup>。

收稿日期:2023-04-22

基金项目:上海市艺术科学规划项目(编号:YB2021G08)。

作者简介:周之澄(1988—),男,江苏江阴人,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景观规划设计、地域振兴设计。E-mail:13913995008@163.com。

通信作者:徐媛媛,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规划设计与管理。E-mail:ivy0226@126.com。

1 长三角区域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1.1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展脉络

知名度较高的农业遗产认定类型一般是指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全球重要农业遗产”（GIAHS）和农业农村部主导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2 年 3 月,原农业部下发了《关于开展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工作的通知》,标志着我

国正式启动“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工作;迄今已认定 6 个批次(图 1)。《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标准》确立了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历史性、系统性、持续性、濒危性、示范性、保障性 6 个方面的主要标准,在认定实践中,又追加了传承历史年限、核心保护要素、农业产业特色、乡土社会系统、保护传承意识等新的认定标准,并明确了“创新保护与利用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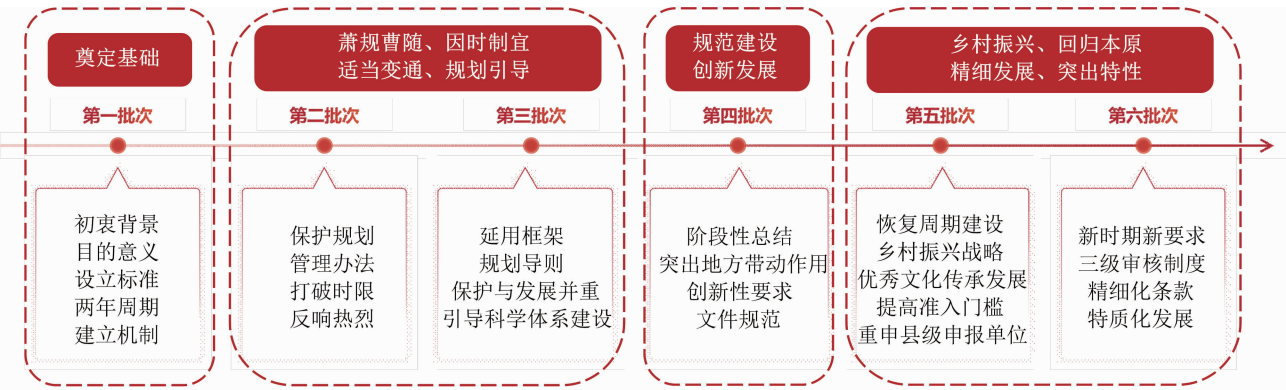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认定工作发展脉络示意图

1.2 长三角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分布关键词

截至 2021 年公布的第六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江、浙、皖 3 省共入选 27 项农业文化遗产(表 1)。浙江省在江南地区的中国重要农业遗产资源中占据优势地位,有 14 项农业文化遗产上榜,这得益于浙江省一直以来的卓越乡村保护与建设工作,对相关资源与乡村文化环境的保存十分重视,山脉连绵的自然环境反而令浙江对赖以生存的乡村产业以及随之衍生的文化生活方式视若珍宝;江苏省仅有第二批次未能入选,其余 5 批共计 8 项名单,温和的东亚季风气候、大量的平原平坦地形以及丰沛

的河流水系资源为江苏乡村提供了优越的农业发展环境;同为农业大省的安徽省农业文化遗产资源较好,虽然可能因为早期的不重视缺席了 3 批名录,但也共有 5 项入榜,且资源类型多样;在江南地区地位举足轻重的上海市因为较高的城市化率,也因为港口城市历史上复杂的变化影响,目前并没有资源入选,但如青浦、金山等地都有大量的乡村区域,青浦区更是作为目前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先行启动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预见地会在将来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做出更大努力。

表 1 长三角地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一览

批次	安徽省	江苏省	浙江省
一	—	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	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
二	—	—	杭州西湖龙井茶文化系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庆元香菇文化系统
三	寿县芍陂及灌区农业系统、休宁山泉流水养鱼系统	泰兴银杏栽培系统	仙居杨梅栽培系统、云和梯田农业系统
四	铜陵白姜种植系统、黄山太平猴魁茶文化系统	高邮湖泊湿地农业系统、无锡阳山水蜜桃栽培系统	德清淡水珍珠传统养殖与利用系统
五	—	吴中碧螺春茶果复合系统、宿豫丁嘴金针菜生产系统	宁波黄古林蔺草—水稻轮作系统、安吉竹文化系统、黄岩蜜橘筑墩栽培系统、开化山泉流水养鱼系统
六	太湖山地复合农业系统	启东沙地圩田农业系统、吴江蚕桑文化系统	缙云茭白—麻鸭共生系统、桐乡蚕桑文化系统

在 3 省 27 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有 4 项同时也名列“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分别是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浙江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就乡村景观元素而言,仅此 4 项农业文化遗产就可谓“田、水、林、鱼、蚕桑”等经典江南“鱼米之乡”的文化景观要素十分齐全,同时也包含了江南大部分平原区域少见的山脉元素,体现了有限资源条件下的农业文化智慧与特质性景观生成。

从农业产业发展与文化景观成因的视角分析,其关键词之一是“特色农耕”:兴化垛田基于大面积水域的块状田地区别于传统的田地耕种,因其独特的少陆地多水系地貌、穿行期间的水乡小舟与颜色鲜明的黄色油菜花群形成异于他地的乡村产业与文化景观,并随之易于衍生出休闲旅游、特色农产品等产品服务体系;青田稻鱼则在传统田地耕作基础上最大化利用水稻田沟渠的有利条件,使稻田养鱼与水稻种植相互平衡形成二极稳定的生态系统,在平地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呈现出了田地、水沟相映成趣而欣欣向荣的生产场景。

关键词之二为“源远流长”:无论垛田、稻鱼还是香榧群都已历经超过千年历史,蚕桑更是汉文化经久不息的代表,这些发源于古代原始农作“耕渔蚕桑”经典农业模式的产业经过长时间的多方检验,产业模式与景观形态成熟而稳定,对乡村环境的适应力极强,在新时期也同样会具备蓬勃的生命力。同时,如果根据农作基本形态将垛田视为基础种植、青田稻鱼视为种植加养殖、古香榧群为林果培育,桑基鱼塘则在产业方面更为复杂,是“一种具有独特创造性的洼地利用方式和生态循环经济模式”,集成了塘基种桑、蚕桑丝织、水塘养鱼等内容,突出塘桑蚕鱼互补的零污染生态自平衡循环利用理念,其所呈现的文化景观形态也更为复合。这也是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创新利用的价值所在,关键在于如何妥善运用其资源要素,合理转化为可视、可触、可用而异质性的新型乡村文化景观体系<sup>[11]</sup>。

## 2 长三角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典型景观

### 2.1 长三角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景观类型

江南地区农业文化遗产是基于江南地理与气候条件,根据一个特定区域内乡村人群历史性的农业生产活动,长时间人地互相作用关系所形成的一

整套农业文化活动系统,包括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内容。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共同生成的结果,研究其所形成文化景观的文化元素,首先应该从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 2 个方面分析其主要类型,再根据每个案例的具体情况层层深入。27 项长三角区域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有几种较为典型的自然景观基础条件,包括江南文化景观意象中最有代表性的河流水系,江南地理环境中多丘陵地带的山地景观,代表乔木植被丰茂的林木与林果景观;以及基于人地农耕互动、盛产粮食的代表性半自然土地景观(包含低矮灌木、草本植物作物等),由于农耕民族田间种植的基本属性而将田地景观视为江南地区自然景观基底的一种;人文景观则根据其农业产业形式、主要产出及地方族群等因素各有异同(表 2)。

根据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材料与官方描述,江南地区 27 项农业文化遗产所在地的主要自然景观基础类型,涉及山地景观的“山”元素遗产有浙江云和梯田农业系统等共 11 项,“林”元素遗产有江苏泰兴银杏栽培系统等共 13 项,“水”元素遗产有安徽寿县芍陂(安丰塘)及灌区农业系统等共 10 项,“田”元素有江苏启东沙地圩田农业系统等共 11 项(表 2),4 种自然景观基础类型分别占比 41%、48%、37%、41%,相对而言分布比较均匀,并没有如大众印象中江南水乡“鱼米之乡”的“水”“田”2 种元素占据景观的绝对主导地位,这恰恰与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筛选标准中对自然与人文环境二者发展适应性的强调较为吻合,关注的是人类社会发史中农业产业立足的根本,在于人类应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与改造智慧;当然也从侧面说明了江南地区自然景观资源的丰富度。

### 2.2 “山-林-水-田”的景观基础格局

山地景观是唯一在 27 项农业文化遗产中都没有单独支撑景观基底的自然景观类型,11 项包含“山”元素的遗产都有其他自然景观元素发挥作用。山脉地形是地壳变化的直观产物,与人文景观尤其是农业产业、农业文化的关联度相对较低,甚至在这个时候都是农业发展的障碍;但山地决定地形基本条件、高差以及地块基本形态,是景观设计中的基础地形要素之一,同时山地通常伴随着“林”元素较为丰茂的植被体系,往往也被视为物产丰富的景观意象。例如在安徽黄山太平猴魁茶文化系统中,独特的高山森林生态环境自成体系,并因农业活动

表 2 长三角中国重要农业遗产景观类型一览

序号	遗产名称	自然景观类型	人文景观类型
1	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	水;田	行船摇橹;垛田耕种
2	江苏泰兴银杏栽培系统	林	采摘科普;白果文化
3	江苏高邮湖泊湿地农业系统	水	采集渔猎;饭稻羹鱼;高邮湖物产
4	江苏无锡阳山水蜜桃栽培系统	山;林	桃花桃果文化
5	江苏吴中碧螺春茶果复合系统	田;林	茶果种植养护;茶果文化
6	江苏宿豫丁嘴金针菜生产系统	田	管理加工;金针菜文化
7	江苏启东沙地圩田农业系统	田	垦荒牧渔;海陆文化
8	江苏吴江蚕桑文化系统	林	蚕桑;丝织
9	安徽寿县芍陂(安丰塘)及灌区农业系统	水	芍陂水利工程文化
10	安徽休宁山泉水养鱼系统	山;水	山泉养鱼文化生态系统
11	安徽铜陵白姜种植系统	林;田	栽培技艺;白姜文化
12	安徽黄山太平猴魁茶文化系统	山;林;田	制茶技艺;猴魁茶文化
13	安徽太湖山地复合农业系统	山;水;林;田	太湖山地复合农业文化系统
14	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	山;林;田	田鱼文化
15	浙江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	山;林	林间农作;赞美香榧
16	浙江杭州西湖龙井茶文化系统	山;水;田	采制工艺;龙井茶文化
17	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	林;水	蚕桑;养鱼
18	浙江庆元香菇文化系统	山;林	林木植菇;香菇产品文化
19	浙江仙居杨梅栽培系统	山;林	杨梅种植;梅果文化
20	浙江云和梯田农业系统	山;田	起伏梯田农业体系营造;梯田四季文化
21	浙江德清淡水珍珠传统养殖与利用系统	水	附壳珍珠养殖技术;粮桑鱼畜
23	浙江安吉竹文化系统	林	竹文化;竹产品文化
24	浙江黄岩蜜橘筑墩栽培系统	林	筑墩柑橘栽培技艺;柑橘产品文化
25	浙江开化山泉水养鱼系统	山;水	山泉养鱼;清水鱼文化;人工水利
26	浙江缙云茭白-麻鸭共生系统	田;水	生态净化文化系统;茭白麻鸭产品
27	浙江桐乡蚕桑文化系统	林	药食文化;蚕桑

注:表内关键词指较有代表性的景观类型。

形成了森林－高山茶园－森林－村落田园的立体农业景观体系,林地形成高低错落的防护林与隔离缓冲带,茶园建于高山之中,村落田园间或山林中,整体上山地决定群落景观形态、林地提供丰富的植被资源。因此山地景观仍然是农业文化遗产中重要的基础自然景观类型,“山地”突出的是因物理高差在景观视觉层面上所带来的冲击感,是地形起伏的韵律性,而非“山石”所体现的坚实物质性。

林木景观类型是农业活动的重要分支——种植行为的产物,与“田地”景观的区别在于其主要为乔木树种的种植。林木景观因农业产业导向而多以“林果”景观形式呈现,同时也受花卉的文化景观审美意象影响,时常形成林木、花卉、果实的三相景观结构。江苏泰兴银杏栽培系统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在平原地形上进行银杏树的人工栽植,从而

形成单一树种规模化林木景观。同样属于单一“林”元素自然景观分类的还有江苏吴江蚕桑文化系统、浙江安吉竹文化系统、浙江黄岩蜜橘筑墩栽培系统、浙江桐乡蚕桑文化系统 4 项,其中浙江黄岩蜜橘筑墩栽培系统与泰兴银杏较为类似,也以单一品种树种的大规模种植、果品出产以及相关文化系统的形成著名,虽兼顾平原与山地的蜜橘种植但筑墩栽培技艺对地形依赖程度不高;2 项蚕桑文化系统除了人工栽植而形成的桑林外,景观上更多体现的是中华民族蚕桑生产所形成的独特生态系统;浙江安吉竹文化系统则通过竹子这一特殊的植物种类呈现出我国文化体系中竹文化的重要沿革,竹林环境所承载的人文情怀与民族化的主观意趣是观景主体,人文景观意义超越其原有林木景观生态体系。

除“山林”元素组合较为常见外,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的“林田”元素组合从生态系统物种多样化的角度给出了农业文化遗产的“结构性建议”。树林与田地的交杂不仅在景观层次上填满了乔木、灌木、草本植物高、中、低的视觉组合,从景观功能上也优势互补,隔离缓冲、光照与土壤养分配给、根茎果实的复合产出等,从多个不同角度丰富了场地景观元素,增添了文化景观纵深,江苏吴中碧螺春茶果复合系统的茶果间植、安徽铜陵白姜种植系统的外围防护林带、安徽黄山太平猴魁茶文化系统高山林地茶园都是很好的例证,充分验证了我国农耕文化因地制宜、物尽其用的“整合”思想。“林水”元素组合也有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的例子,塘基桑林与湖塘养鱼互成表里,农业种植与农业养殖相得益彰,林地种植便于汲取水源、水系养殖易于获得养分,形成良好的生态循环系统,主景观层次上也有树冠高突、林间疏密与湖塘低洼的组合。

“水乡”的文化景观印象分为水景与乡愁 2 个方面,其核心景观都是江南地区发达的河道水系环绕的聚居情境,早期是乡村环境的田园家乡,后延展至村镇甚至城市的人类聚落,以民居、古桥、古意街巷等为主要景观元素,著名的江南水乡古镇景观体系便是沿着蜿蜒河道的排列民居。长三角三省的农业文化遗产中不乏大面积湖塘蓄积水体的经典水文景观,或为天然或为人工,都为周边区域的农业产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江苏高邮湖泊湿地农业系统、安徽寿县芍陂(安丰塘)及灌区农业系统及浙江德清淡水珍珠传统养殖与利用系统是其中的 3 项典型,共同特点是都以大型集中水体成景为主要景观形式,但区别也很明显:严格意义上而言,芍陂及灌区农业系统应该统计“水”与“田”2 项自然景观类型,蓄水面积与灌溉面积体量相当,且“纳川吐流,灌田万顷”的主要景观风貌体现了引水灌田的农业文化,但考虑到其较少见的古代大体量水利工程壮举以及核心区域的主体水系景观,仍然将其视为单一水系景观元素;德清珍珠养殖系统虽然也有复合业态的农业生产行为,但主要依靠并以特有的珍珠养殖系统而著名,所呈现的主要景观也为优质淡水养殖水网;高邮湖区域则是结合了水系与周边湿地,综合体现采集渔猎、饭稻羹鱼的农业生产生活,物种与物产体系都十分丰富、复合,且舟楫易行。在单一水系景观元素之外,江南地区经典农业文化遗产的自然景观基底中,水、田相依相生与

山间流水的景观格局较为常见,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浙江杭州西湖龙井茶文化系统与浙江缙云茭白-麻鸭共生系统都属于前者的类型,异于传统农业意义上的稻田水系,不管是水网垛田、西湖茶田还是茭白所处水生环境都以水文景观为多而非田地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既有与稻田类似但“田在水中”的田水交混共生环境,也有傍水而种、便于灌溉的田水依傍景观关系;山间流水的景观体系则多利用山泉水系资源满足林果、田地灌溉等农业种植需求,安徽休宁山泉流水养鱼系统、浙江开化山泉流水养鱼系统十分相似,都以山泉资源活水养鱼于山林、村舍之间,算是从农业文化遗产的角度为山地农业养殖另辟“山水”蹊径<sup>[11]</sup>。

田地景观是典型的农耕文化产物。由于我国千百年农耕生活的长时间熏陶,乡村与田地已经紧密结合,形成了乡村景观的“半自然”风貌基础。田地所代表的种植业对于农业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一方面田地景观类型与其他自然景观类型都有良好的结合,由此产生的多种典型乡村田野风貌层出不穷;而另一方面,正因为田地在乡村区域的普遍性,田地作物类型的“特殊性”与“稀缺性”成为田地景观能够脱颖而出的决定性因素。田地景观单一元素遗产资源中,江苏宿豫丁嘴金针菜生产系统与浙江宁波黄古林蔺草-水稻轮作系统都以作物的区域不可替代性,以及生产、加工、管理等过程的独有特点脱颖而出;江苏启东沙地圩田农业系统则是在特殊的海陆相接的盐碱地质条件下发展出的垦荒圩田范式,具备可观的地理与人文环境价值。如上分析,在“水田”元素交汇时,水生环境、水系景观占主导的条件异于一般“田地”的土地景观概念;“林田”景观打破了田地景观近地、贴地的景观视野感,丰富了景观层次;“山田”景观则扭转了山体高差与斜度带来的耕种行为阻碍,形成了如梯田般壮美的景观画卷。

表 2 中列出的仅为长三角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较有代表性的生态景观类型,多为一项特质性元素或 2 项元素组合,但仍有遗产地景观类型较为复合。例如已探讨过的安徽黄山太平猴魁茶文化系统,山地基础地形与大量林木植被加上农业文化痕迹较突出的茶田,形成“山林田”复合景观;村民、茶农穿行于山地、林间、田间,农林耕作形成田园,再凭借“三大阶段、九道手工采制工艺”的“最高超、最精湛、最独特的制茶技艺”积累形成了以高山生

态茶园林茶共育和绿色栽培管理技术体系为代表的人文景观,结合而成了自然景观内外高低层次分明、农业景观立体、人文景观分时线性的文化景观体系。浙江杭州西湖龙井茶文化系统也依托杭州西湖“山水田园”的景观本底,营造出了基于良好生态环境的湖畔茶田景观体系,三面环山但茶田多存于西湖周边的平地、缓坡,得益于环山地形与大面积水域的优越自然环境将 3 种自然景观类型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人文景观方面同样以采、制茶工艺为主,但因杭州西湖自古以来的文化艺术意象添加了如以灵隐寺为代表的禅宗、养生、观景多元文化,内涵与外延都得到了较大延展;也正因为杭州西湖响亮的名声与“文化景观遗产”的入选现状,想要列名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农业文化梳理与产业开发方面还需要做出较大努力。安徽太湖山地复合农业系统从名称上就体现了其农业系统的复合特点,背山面水的山地-河谷地形提供了平缓农田地形与缓坡林果畜牧空间,水域也被划分为大、小 2

种水体,即近自然大面积水体与近村舍水塘式小面积水体以分别发展水产养殖;“山环水抱,明堂开阔”的村落聚居原则形成了以防御性民居“大屋建筑”为核心的村庄人文景观,整体上“山-林-河-田-村-塘”的复合型土地利用格局体现了安徽太湖山地复合农业系统在有限生态条件下充分开发多种农业生产、生活形式的环境利用智慧,同时其移民文化与原乡文化景观融合的人文景观特征也较有特色<sup>[11]</sup>。

3 长三角地区农业文化遗产景观基因

3.1 代表性文化景观基因

根据上述分析,“山-林-水-田”4 项基本元素构成了长三角农业文化遗产的景观基底,各遗产点的风土、风景、风物、风俗的组合形成了其典型文化景观,并在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中固化成“文化景观基因”。

表 3 长三角地区农业文化遗产代表性文化景观基因

景观类型	典型景观	景观基因	遗产代表	备注
自然景观	山林景观	林下种植	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	鱼鳞坑种植;生态文化
	山林景观	竹林竹海	安吉竹文化系统	
	山水景观	山泉养鱼	休宁、开化山泉养鱼	
半自然景观	山林稻田	鱼米之乡	青田稻鱼共生	人造类、有机进化类;单一树种的文化衍生
	山野林果	茶田果园	阳山水蜜桃	
			西湖龙井	
人文景观	水天良田	“岛式”垛田	兴化垛田	复合型循环生态农业;乡村文化
	林水桑田	男耕女织	湖州桑基鱼塘	
	庄台民宿	村庄聚落	安徽太湖山地复合农业系统	
			西湖龙井、吴江蚕桑	
	茶场农博	农业加工		

3.2 “双遗产”的文化景观基因体系

与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不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评选标准与价值体系主要聚焦于全球重要性、粮食与民生保障、生态系统功能、知识与技术适应性、社会文化价值与景观资源特色 6 个方面,主要考虑的是农业文化资源的产业特点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稀缺性和影响力,景观特色仅作为其中的一项关注点。但也恰恰是其景观特点最能体现文化景观基因的特殊作用。

分析 4 项“双遗产”案例,第 1 项是 2005 年入选的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自然景观方面,青田县属丘陵山地地貌,基础地形以低山和丘陵为主,

2 228 km<sup>2</sup> 的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 89.7%;而 132 km<sup>2</sup> 的平地仅占 5.3%,与水域面积基本持平,青田地貌特征呈现“九山半水半分田”格局。独特的山林地貌使其稻田以梯田及小型平地空间的形式存在于丘陵包围之下,因此虽然青田稻鱼的主要呈现场景为稻田水系(非大面积水体),体现的是农耕文化下“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田地景观基础,仍然应该将山林地貌视为其重要的自然景观类型。人文景观方面,青田稻鱼在种植与养殖协作、田间管理及水田渔业上长时间积累而成的一套成熟农作景观体系,和以田鱼产品、青田鱼灯舞为代表的田鱼文化衍生景观都较为知名;相对而言其村落文



化景观似乎欠缺辨识度,但也因田鱼共生生态循环系统出产丰富、减少化学依赖的特点满足村容整洁、生活富裕等乡村环境建设要求。总体上,其乡村景观体系都围绕着田鱼文化的“鱼”“米”2 项关键性要素展开,鱼在田中、米鱼相合的乡愁记忆跃然乡野<sup>[12]</sup>。

第 2 项是 2013 年入选的浙江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香榧树林与会稽山脉组合而成的山林景观体系以沿山坡而上的香榧树群为主要景观标志物,形成了“嫁接技艺—林果产物—文化咏叹”条线式较为简单而稳定的农业文化架构,在景观呈现上以山林元素为基础、鱼鳞坑式梯田为点状突出;人文景观价值则主要体现在传承超过千年的香榧人工嫁接技术、丰富的林下作物产出,以及随之同样沿袭千年的香榧文化艺术作品、传统观念以及民俗等文化产物。会稽山脉、香榧树林与传统村落融为一体,形成了壮观的竖向层次性景观;“鱼鳞坑”石桩梯田围合的香榧林、针叶林、毛竹林等树种的山石林带景观与生态涵养功能,香榧、樱桃、竹笋、板栗、云雾山茶等多种物产以及纯属的手工加工工艺,再加上村落活动、祭祀节庆活动等传统观念与做法组成的“香榧文化”群体记忆,共同构成了浙江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的独特文化景观结构。因此,山脉林地、特有“围树”梯田、香榧林下物产以及赞美香榧的文化习俗是文化景观元素提取重点;而同样的,在很大程度上被广袤山势地貌弱化的村落景观也有很大的设计突出空间。

第 3 项是 2014 年入选的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兴化垛田水、田景观元素较为均衡,在自然景观方面“七水三土”的大面积河湖水域风光较为引人注目,在人文景观方面行船摇橹、岛田耕种的“稻饭渔歌”场景意境深远。湖荡沼泽地的连绵水系在形成长三角地区典型水系景观的同时也因其洪涝灾害、陆地少而割裂等天然缺陷给当地农民带来了不小的农业生产阻碍,兴化先民围湖造田,并创造性地在湖中反复堆积泥渣沙浆,逐渐形成多至两三亩、小到几厘的高垛,即为延续至今的垛田,配合如油菜花等代表性农作物,以水上“千岛”“千垛”的奇瑰景象享誉世界。兴化垛田水为底、垛田网格状点缀其间的空间景观格局十分难得,也是以人为劳作积累,扭转水、土不均衡格局以至水、田分庭抗礼,有效将农作劣势基础转化为优势人文景观的完美案例,充分体现了江南文化景观中象征着渔

业养殖与农作耕植“鱼米水乡”的“水—田”元素特征,将“水—渔”“田—耕”的人文农作景观良好地结合在了一起。其自然景观基底与农作文化元素具有十足的元素提取代表性,低洼水系与凸起高田的反差地景符号有深入挖掘的价值,其小微灌排工程、聚居建筑与街道景观形式、桥梁步道等人文景观也具备相当的元素化设计价值<sup>[13]</sup>。

第 4 项是 2017 年的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0.4 万  $\text{hm}^2$  桑地和 1 万  $\text{hm}^2$  鱼塘形成了我国规模最大,同时也是“林—塘”相互包围空间景观结构保存最为完整的江南水乡典型生态农业景观。蚕桑农业文化系统与鱼塘养殖文化系统的组合营造出了具有独创性的桑基鱼塘生态循环经济模式,对所处生态环境的几乎零污染使其呈现出最为原生态的文化景观。它包括了人工密集种植的桑树林,蚕的规模化饲养及蚕丝生产加工,以及以鱼塘淤泥、蚕蛹蚕沙、桑营养土等为核心的内循环灌溉、排水与给肥系统。

从以上 4 项升格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案例来看,它们都是复合的生态农业系统,同时也具有更优质的文化景观基因,可被归纳为:复合的自然景观+先进的循环农业技艺+特色的农业产业系统。

## 4 农业文化遗产导向的乡村景观创新设计思路

### 4.1 围绕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乡村景观价值共创设计

农业文化遗产中蕴含着当地人们宝贵的生产、生活经验,同时也具备保存完好的生态基底,所体现的由特有农业生产方式衍生的一系列习俗、文化等生活模式需要被良好的保护与传承延续,应以整体全面的眼光看待与核心农业活动相关的“衍生过程”与“副产品”,同样重视与之紧密相连的民间传说、文艺表演、工艺美术等,力求完整地呈现出农业遗产的全貌。农业文化遗产在我国与世界范围内的评选都以“系统”为单位,充分体现了围绕同一农业主题下地形地貌等自然景观基底、人类生活痕迹及人类活动本身以及地域族群衍生文化行为等多项生产、生活、生态内容的系统性统一<sup>[14-18]</sup>。

农业文化遗产对于乡村建设的带动作用至关重要,而其关联性文化景观则是最为直观、高效的表现形式。正因为文化景观脱胎于农业生产与生活,以乡村农业产业为核心,是人类群体行为长期

作用于自然环境、与自然和谐共存而产生的人文地景,忠实地记录了乡村这一人类聚落的发展模式,因此才能与地方产业发展、人才培养、资源利用等全方位挂钩。这一现象在江南乡村地区这样自古以来“农耕牧渔”经典农业模式十分发达的地方体现得尤为明显。

从这些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产生和构成的复杂性可知,要系统传承文化景观基因需要在合力保护遗产系统的前提下,集合能够对农业遗产地乡建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核心利益相关者,遵循价值共创网络主导逻辑,通过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高联结属性的充分互动,形成“价值主张-价值创造-价值共享”的价值共创整体设计思路。通过识别不同遗产地各利益相关者所拥有的资源基础提出整体性的价值主张,统一思想观念,形成价值共识;通过资源的获取、释放、整合以及重构优化和革新价值内容,推动价值创造;基于各类平台的合作拓宽价值共创网络中的价值链条,实现价值共享;在这一过程中,资源的流动以及利益相关者的互动方式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呈现动态化的迭代升级。这样一种动态化的价值共创整体设计模型能够创新传承优秀文化景观遗产,为建设美丽新江南创造新的乡村景观。

这样的农业遗产传承与创新目标需要由以下主体参与,首先是业主方:对地方条件比较了解,包括拥有者、管理者等,针对农业文化遗产申报提出保护与利用的相应需求,但不具备景观设计专业知识;之后是设计与建造师(匠师):掌握乡村景观设计方法与效果呈现手段,了解实践落地流程与做法,但对地方条件了解不深入;最后是公众:文化景观所处江南乡村环境的使用者,包括长时性使用居民与短时性使用游客等群体,能够提出基于自身的经验性判断与意见看法(图2)。三方共同努力构

成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创新、利用全过程的乡村景观价值共创整体设计方法。

#### 4.2 重视乡村景观设计师的培养

长三角乡村建设过程中,乡村主体退化、缺少地域特色、以农业为主的乡村产业发展艰难等“建设性破坏”困境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设计学专业视角出发,懂农业、爱乡村的乡村设计力量缺失是导致乡村重“建”而轻“设”、千村一面等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设计有助于明确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路径、有效对接城乡资源,城市设计与乡村设计有着不同的方法论、不同的目的、不同的实现路径,但在实践中,设计师常把城市规划设计的思维生硬地用于乡村设计。

乡村设计的文脉基础来源于鲜活的乡村生活,其地格扎根于传统的乡村环境。要更好地发展乡村设计,唯有建立科学的乡村设计教育体系,以《乡村设计定山宣言》等文件与共识为纲要,加速培养专注的乡村设计师。在乡村景观设计这一需要知识与经验积累的行业中,通过农业知识特别是对农业遗产知识的教育培训,充分考虑如何将优质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为乡村景观发展的助推动力,通过产业与文化景观融合发展的方式,精准定位乡村景观与产业区别于城市环境的特质,才能使江南文化区在长三角一体化与乡村振兴的双重国策下成为区域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引领者<sup>[19]</sup>。

#### 4.3 基于农业遗产文化景观基因的乡村景观设计实施路径建议

从设计的角度来研究乡村环境的各个方面,需要整体考虑人工和自然等空间要素,设计出使这些要素和谐统一的美丽乡村,既满足生产和生活的功能需求,又考虑到环境安全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以长三角区域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景观基因研究为基础,其基于江南文化地格的乡村景观整体设计策略可分为以下3个步骤:

##### 4.3.1 修复形成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自然地脉

生态景观的自然性是乡村地格的基础,长三角地区的生态景观基础并非单一的耕地,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长三角地区特定时期乡镇工业的高速发展和快速城市化,令山林景观被采石等掠夺性开发方式破坏得遍体鳞伤,废弃的宕坑与几近削平的山头随处可见,连片的湖荡被填埋的支离破碎,“退耕还林”还是“退林还田”的争端也屡见不鲜。因此江南乡村景观设计的首要任务是按照“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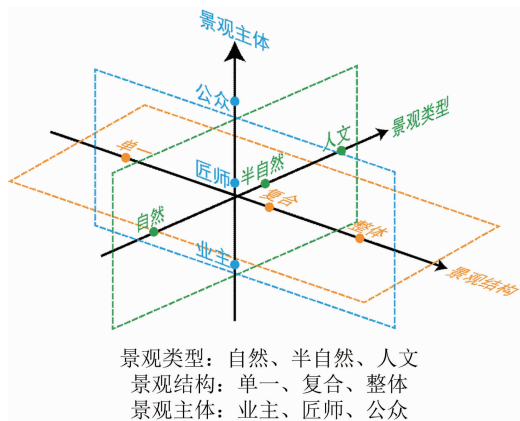


图2 乡村景观价值共创整体设计(holistic design)模型



林-水-田”的基本格局进行环境生态修复。同时应避免城市化的绿化方式、绿化树种,尊重乡村的自然肌理与地带性植被规律,宜林则林、宜树则树、适地适树,营造符合自然规律的复合型植物景观。

#### 4.3.2 延续形成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历史文脉

长三角地理区域长久以来积淀所形成的江南文化是我国最有代表性的地域文化种类之一。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江南文化的特质构成了长三角共同的精神家园,江南水乡的风景意象是江南地区文化景观的重要表现方面。但由于受文人雅士吟咏江南地区“杏花春雨江南”的景观风情影响,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水乡民居、古镇街巷往往被认为是江南的典型文化景观。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延续的景观基因却没有在乡村景观建设中得到应有的体现<sup>[4-5]</sup>。

在表3提炼的长三角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9个代表性文化景观基因中,林下种植、竹林竹海、山泉养鱼为自然生态景观类型,茶田果园、岛式垛田、村庄聚落和农业加工等典型景观他处也有分布(表2),唯有鱼米之乡、男耕女织这2个文化景观遗产基因与江南文化的血脉更加紧密,值得重点加以传承和创新。

鱼米之乡的文化景观基因在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得到了最佳显现。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注解从多个方面阐释了青田稻鱼的景观价值:“被森林环绕的稻田塑造了景观”,奠定了“山林-田地”式从外到内的景观基础;“由于稻田面积较小,水稻种植者和鱼类养殖者在相同田地间共同劳作的合作管理模式至关重要”,体现了农民充分利用资源,彼此之间、与环境之间和谐共处的农业生存智慧;“稻鱼制度被描述为一种文化方式,稻鱼系统鼓励基本生态功能、提供多种产品与功能”,说明了青田稻鱼在农业物产与文化生活方式上的丰富度。

而正如上面所述,山林景观元素在系统中基本作为背景式自然景观存在,其核心文化景观基因仍然集中在不利环境条件下“水-田”元素的交融与稻鱼共生模式的存续。因而在尊重其农作生态循环系统与相应衍生文化的基础上,梯田地貌、田鱼产品及其衍生文化活动应该成为文化景观元素提取的重点,而村落景观则成为了更有针对性的设计目标。在当下的乡村景观设计过程中,于田野上架起河豚鱼的雕塑、营造大闸蟹建筑、竖起渔舟村标虽高效、直观但却并不能完全代表鱼米之乡的文化

景观,应该把精耕细作、循环农业的农耕文化传统渗透在农业生产场景中,构成原汁原味的新时代稻作文化景观。

男耕女织是江南地区小农经济的经典模式,自然也体现小农经济的核心特点:自给自足。“衣食”需求中,除了“鱼米”,“穿衣”也同等重要,蚕桑丝织文化因而成为我国农耕文明中最有代表性的农事生产和生活文化之一。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和江苏吴江蚕桑文化系统虽然跨省,但相距仅30~50 km,2个遗产系统所处太湖流域经久累积的灌排水网与圩堤水田系统最能体现江南地区平原地带地势低洼、水网纵横、内涝外旱的地理特点,以及沟渠纵横、水利发达、农事基建整体完备的人文景观风貌,根据南北向与东西向的空间方位特点,俗称“纵浦横塘”。这两大以蚕桑文化为主题的遗产人文农业景观在其景观体系中占绝对主导地位,传承这样的文化景观基因等于传承了这里的农业经济和核心乡村景观。

近年来受水产效益高于养蚕效益、产业链的后端开发不足等因素影响,蚕桑丝织文化始终未能形成较为健全的文化景观与产品体系。事实上,桑树的景观价值一直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和系统设计。种桑养蚕不只为织布裁衣,桑树作为植物中蛋白质含量极高的树种,桑叶可以煲汤炒菜,桑基木耳口感独特鲜美,桑葚不仅可以鲜食还是酿酒的高级原料,因此栽桑不仅可以传承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景观基因,也是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难得的“可食用景观”。

诚然,针对重要农业遗产的核心景观资源,结合环境的归属性和认同感,根据场所精神设计乡愁景观;根据公众的审美信息与景观基因的匹配,通过对环境空间的设计传达美感的信息;考虑到人们行为的多样性与审美趣味的多元性,用遗产景观基因的丰富性创造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景观多样性,可以满足新时代高品质生活的新需求。

#### 4.3.3 突破区划限制建设区域文化遗产与景观共同体

乡村文化的根基在乡村生活,乡村生活的根基在食粮,长三角区域的基本食粮是稻米。“鱼米之乡”是长三角经济社会和地理特征的标签,但在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稻田面积减少速度非常快。土壤重金属污染、建设性破坏等问题在加速破坏长三角地区的地脉和文脉,一向以“精耕细作”著称的稻作文化传统也存在断裂的危机。稻作及其衍生

传统文化生活方式不仅仅能保证粮食安全,其生态效益、景观与防洪防汛等多元价值体量甚至远超经济价值。以生产稻米的水稻田、耕织绵延的文化生活以及象征生态的田林水系为核心景观元素,围绕农业遗产优先从“水”“田”两大类型出发构建新时期乡村文化景观体系,创设如“长三角国家稻作文化公园”等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区划限制的乡村文化景观遗产集群,保护乡村自然生态的“原真性”与历史文化的“乡村性”,可以唤起区域内全民的“乡愁”记忆,同时也能搭建起一个全区联动的江南乡村文化基因保护与传承的重大平台。

在具体实施上可借鉴英国经验,在长三角地区划定“杰出景观区域”。针对具有独特自然地景价值的资源,强化对乡村原生态地质地貌、动植物的保护;同时也积极发掘当地历史人文资源与自然景观的联系,大力开发农业、林业和其他乡村产业,保证乡村区域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充分保护当地居民的利益。

## 5 结语

“美丽乡村”的主体是乡村,乡村的“乡村性”直接体现在乡村景观风貌上,而其中所蕴含的能够传承乡村地域文化的核心内涵是关键点。新时期“乡村振兴”工作中“文化”与“产业”的振兴是两大主要方向,因此以最能代表乡村特点的农业产业与农业文化为内核的农业文化遗产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于农业文化遗产资源较为丰富的长三角地区来说更是如此。“江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作为长三角文脉延续的主体形态,应该被当作重要战略资源反映在区域文化价值认同机制构建的多个方面<sup>[20]</sup>。因此,交叉共生而通过农业文化遗产形式存续的江南文化景观,尤其是以如“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等典型形式被特质化突显的景观元素与文化景观价值观念,值得我们在乡村建设工作中妥善保护、合理利用。而无论是田地农耕、桑林养蚕,还是水陆共生、山间林下,都因自然环境基底与乡村特有产业充满了乡野风情而饱具“乡村性”,可明显区别于大众印象中城市型江南文化景观“古镇小桥流水、城市私家园林”的一般印象,在各旅游目的地可视性文化景观高度同质化、城市建设“千城一面”城市病愈发常见且乡村地区

文化景观系统亟待振兴的如今,很有现实应用意义。

## 参考文献:

- [1] 王建革. 19—20 世纪江南田野景观变迁与文化生态[J]. 民俗研究, 2018(2): 34—47, 157—158.
- [2] 周之澄, 张羽清, 周武忠. 长三角乡村振兴实践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 农村工作通讯, 2021(4): 32—34.
- [3] 张羽清, 周武忠. 江南文化与乡村经济发展问题研究[J]. 东方设计学报, 2022, 2(1): 57—63.
- [4] 张松. 小·桥·流·水·人·家——江南水乡古镇的文化景观解读[J]. 时代建筑, 2002(4): 42—47.
- [5] 唐旭. 简谈江南水乡传统文化景观的延续[J]. 广西城镇建设, 2008(12): 63—66.
- [6] 吴燕妮. 江南地区地域性景观设计研究[D].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2011: 72.
- [7] 许悦. 江南园林的文化景观传承与发展[J]. 产业科技创新, 2019, 1(12): 127—128.
- [8] 朱志平, 王思明. 价值挖掘与路径选择: 长三角地区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与利用研究[J]. 中国农史, 2021, 40(6): 134—146.
- [9] 王涛, 傅盈盈, 严梦雨, 等. 江南水乡古桥文化景观空间解译与特色认知研究——以绍兴安昌古镇为例[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1, 32(1): 206—210.
- [10] 周武忠. 新乡村主义论. 世界农业, 2014(9): 190—194.
-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实录[EB/OL]. [2023-04-15]. <http://www.moa.gov.cn/ztzl/zywhys/>.
-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青田田鱼[EB/OL]. [2023-04-15]. <http://www.anluyun.com/Home/Product/29184>.
- [13]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EB/OL]. [2023-04-15]. <https://www.fao.org/giahs/giahsaroundtheworld/designated-sites/asia-and-the-pacific/xinghua-duotian-agrosystem/zh/>.
- [14] 苑利.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我们所需注意的几个问题[J]. 农业考古, 2006(6): 168—175.
- [15] 陈艳, 杨阳, 潘健峰, 等. 基于“三生”空间视角的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研究文献分析与评述[J]. 西南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2, 6(1): 16—23.
- [16] 徐业鑫. 文化失忆与重建: 基于社会记忆视角的农业文化遗产价值挖掘与保护传承[J]. 中国农史, 2021, 40(2): 137—145.
- [17] 李明, 王思明. 农业文化遗产: 保护什么与怎样保护[J]. 中国农史, 2012, 31(2): 119—129.
- [18] 闵庆文. 关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中文名称及其他[J]. 古今农业, 2007(3): 116—120.
- [19] 周武忠. 东方设计学研究[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1: 452—453.
- [20] 刘士林, 姜薇. 长江文明视域下江南城市发展与文化传承[J]. 江西社会科学, 2022, 42(4): 41—49.